

苏区干部好作风是如何练就的

肖小华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与组织失去联络，虽身藏一包作为党的活动经费的金条，但衣衫槛褛，乞讨度日，最终把金条交给党组织。1934年3月20日第164期《红色中华》刊载的《猛烈开展的节省运动》报道：中央财政、中央教育、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的全体工作人员，每人每日节省二两米，菜金若干。陆定一、邓颖超、博古、陈云、毛泽覃、罗迈、潘汉年等23名领导干部联名致信《红色中华》，决心每天节省二两米，不领夏季衣服，以支援革命。“苏区干部作风好，事事走在人前头。学习军事他带头，参军作战他带头，执行任务他带头，节约粮食他带头，遵守纪律他带头，参加劳动他带头，优待红属他带头，慰劳捐献他带头，购买公债他带头，供销入股他带头。事事带头作模范，真是穷人好干部。”这首《苏区干部“十带头”》的歌谣生动反映了苏区干部事事走在前面、处处模范带头的优良作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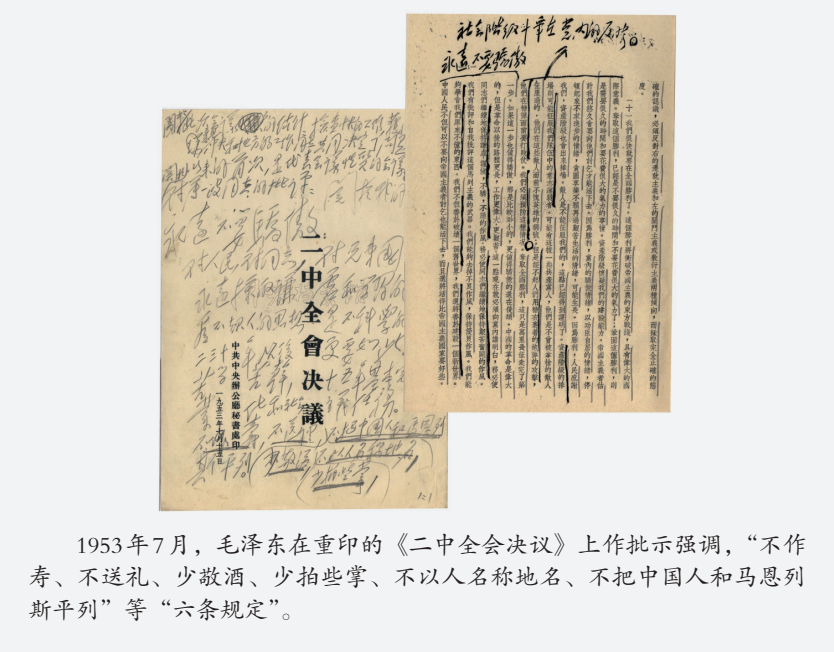
苏区干部好作风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形成的。从实际出发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而且是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要同我国实际相结合，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先后开展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农村社会调查研究，发表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著名调查报告。在毛泽东等苏区领导的率先垂范和倡导影响下，中央苏区的各级党政军机关掀起了调查研究的热潮，为科学决策提供保障，开创了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注重调查研究的一代新风。刘少奇、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从根据地实际出发，纠正了脱离根据地实际的“左”的错误，制定了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促进了苏区经济的发展。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期间，针对有些地方存在乱分田、假分田、占着好田不放手的现象，他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挨家挨户访问，一块田一块田地查看，在掌握第一手情况后，对全县土地重新划分，受到老百姓的拥护。“干部常来我们乡，巡视我乡家常；油盐柴米样样问，温暖送到心窝上。”这首《巡视制度好》的歌谣生动描绘了苏区干部深入实际、用脚丈量土地、用心倾听民意的优良作风。

苏区干部好作风在教育监督和约束下不断完善。一是发挥干部教育培训作用，不断夯实苏区干部作风建设思想基础。思想教育作风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中央苏区时期，党把干部教育培训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列宁室、俱乐部以及大量的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和各种党团训练班，加强了苏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党的组织纪律教育，为中央苏区的作风建设奠定坚定的思想基础。二是完善干部监督机制，遏止了苏区干部不良作风的出现和蔓延。为防止和惩处腐败行为，中央苏区构建了党内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和工农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机制，对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败或消极怠工等现象进行监督纠治。《红色中华》《斗争》等重要报刊，不仅开设“红板”“红圈”等栏目，表扬和鼓励那些工作积极、廉洁奉公、作风正派的苏区干部，而且开辟“突击队”“铁锤”等专栏，专门对苏区干部的不良作风和违纪行为进行批评和揭露，有力制止了苏区干部腐败堕落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滋生。三是以“铁的纪律”促进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中央苏区时期，不仅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完善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提出了“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少数服从多数”“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等许多原则性要求，而且制定了许多与作风建设相关的纪律制度，如《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等，强调“一切违反苏维埃法律对于革命有损害行为的党员，必须比非党员工农分子受更严厉的革命纪律制裁”。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维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强化党的作风建设。

苏区干部好作风是领导干部以上率下带出来的。一打口号不如一个行动。中央苏区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严以律己、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时时处处发挥着模范带头作用，留下了毛泽东带领警卫战士为沙洲坝人民掘井引水、朱德帮助农民插秧收稻、周恩来帮助红军家属砍柴挑水等佳话。“腰缠万贯的讨米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自带干粮去办公，在

为“赶考”立规矩的“六条规定”

段文锋



1953年7月，毛泽东在重印的《二中全会决议》上作批示强调，“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些掌、不以人名称地名、不把中国人和马克思列宁并列”等“六条规定”。

——西柏坡，向北平（今北京）进发。登车前，他高兴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讲，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车队行进在广阔的华北平原上，毛泽东和大家聊起了中央机关的几次转移，1947年3月撤离延安、1948年3月离开开平脂县杨家沟、1949年3月离开西柏坡，他说，三年三次大行动都是3月份，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值得注意的是，三百多年前的3月份（农历），明朝末年农民起义军首领李自成率众进占北京城，可仅仅40多天后，他建立的大顺政权就因为腐化享乐、纪律废弛等一系列问题而迅速走向溃败。毛泽东一直很重视李自成“赶考”失败的教训，时常用以教育领导干部。1944年，他就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材料，他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50年，从苏

联访问回国的毛泽东，因为看到哈尔滨、沈阳招待的饭菜很奢侈，就生气地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我们不能这样做。”1953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大步向前迈进，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首次提出，“一五”计划开始实施，抗美援朝战争取得最终胜利，农业生产合作掀起热潮等等，新中国的建设如火如荼。但由于缺乏经验，加之党内骄傲情绪有所抬头，导致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问题。7月，毛泽东在重新印发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上作批示，再次强调了“六条规定”。8月12日晚，他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还专门讲道：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毛、恩、列、斯并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

孙家栋：“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宋泽滨

孙家栋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中国人造卫星技术、北斗导航卫星和深空探测技术的重要开创者。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0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8年获“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获“共和国勋章”。孙家栋多次说过：“我的信念是：国家需要，我就去做。”从学习飞机设计到转行研制导弹武器，再从主持东方红一号卫星到成为航天重大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总是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融为一体，把浩瀚太空作为报效祖国的舞台，把国家需要作为唯一的追求。

送卫星上天，中国迈入空间时代

正当踌躇满志全身心投入新的导弹型号设计之时，1967年7月29日，孙家栋被调到正在筹备的空间技术研究院搞卫星。这一年，孙家栋38岁。9年前的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1965年中国卫星事业再次启动。在卫星工程进行到关键时期，经毛泽东批准重新组建空间研究机构。钱学森点名孙家栋担任卫星总体技术负责人，也就是后来的总设计师角色。孙家栋临危受命，由研制导弹又转行主持研制人造卫星。为了在1970年实现“上得去、抓得住、听得清、看得见”的目标，孙家栋首先确定并坚持了一个重要原则：简化。凡是过高目标、过繁程序及不必要的设计，都要简化。在钱学森的支持下，科学探测目标让一颗卫星来实现，动力系统能保证计划运行时间即可。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中国人独立自

主完成的东方红一号卫星，被同样由中国人自主研制的长征一号火箭托举上天，中国从此迈入太空时代。

曾任七机部副部长的张镰斧后来评价说：“没有孙家栋的这两下子，卫星发射可能还要再等几年啊！”1986年5月，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评选结果出炉，“可返回型卫星及东方红一号卫星”荣获特等奖。孙家栋说，东方红一号当时“让全国人民扬眉吐气，我有幸参与其中，终生难忘”。此后，孙家栋又先后担任了我国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资源一号卫星工程、东方红三号通信广播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并全部发射成功。

担工程总设计师，“北斗”“嫦娥”遨游太空

1985年10月，孙家栋在担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2年后，被任命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通过近10年的努力，孙家栋主持了国际合作谈判及履约发射任务，为中国航天走向世界立下汗马功劳。此外，孙家栋还参与了组织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论证工作，为中国人早日进入太空奔走呼吁。为了加快进军太空步伐，国家又相继启动了北斗卫星导航工程和探月工程。孙家栋又把目光投向浩瀚宇宙。从1994年2月到2004年3月，孙家栋先后被任命为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工程总设计师、探月工程总设计师、绕月工程总设计师和北斗第二代导航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犹如老骥再上路，无鞭自奋蹄。早已功成名就，为什么还要接下这充满着各种风险和挑战的重担？孙家栋还是那句话：“国家需要，我就去

做。总之，要坚持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可见，毛泽东对这些规定十分重视。

正是出于对胜利了的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无比冷静和深刻忧思，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剑指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和居功自傲情绪、“革命到头”思想。1951年，党中央作出以3年时间进行一次整党的决定，还发动了“三反”运动，抓住重大典型案件进行严肃处理，对地位高、功劳大的腐败分子刘青山、张子善进行公判并执行死刑。经过整党，有41万人被开除出党或被劝告退党。通过这些坚决斗争，我们党继续保持了艰苦奋斗作风和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全党的团结得到进一步增强。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柏坡，在记载着这“六条规定”的底底白字展板前驻足良久。他一一对照着说：“不做寿，这条做到了；不送礼，这个还有问题，所以反‘四风’要解决这个问题；少敬酒，现在公款吃喝得到遏制，关键是要坚持下去；少拍掌，我们也提倡；不以人名命名地名，这一条坚持下来了；第六条，我们党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共产党人该以怎样的作风、面貌去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开创新的时代，这是我们党一直在思考和回答的问题。2012年，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从“六条规定”到中央八项规定，充分体现了中央领导同志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带头加强自我约束的精神品格，体现了我们党始终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不断改进作风的优良传统。



做。”那些年，孙家栋“北斗”“探月”双肩挑，经常上午开会研究“北斗”，下午与人讨论“探月”。在这两项国家级重点工程领域，孙家栋都有独创性贡献。

在北斗二号立项后，孙家栋就提出核心元部件必须百分之百国产化，原子钟一定要自己造，要打“中华牌”。北斗完成组网后，作为总设计师的孙家栋并没有停歇，而是下大力气紧抓北斗的应用。作为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按照中央批准的“绕、落、回”三步走战略，对任务进行了开创性的拓展。嫦娥一号成功后，孙家栋支持对其备份星任务进行拓展延伸，作为嫦娥二号为下一步任务进行探测，实施了国际上首次对距地球约700万千米深空中的图塔蒂斯小行星进行近距离探测并拍摄到该小行星照片。当嫦娥三号任务成功后，孙家栋又支持将其备份星任务拓展，作为嫦娥四号提前实施探月工程四期的首次任务，成为世界上首个到达月球背面的航天器，创造了世界纪录。孙家栋亲身见证了从中国航天近70年的辉煌历程，亲眼目睹了北斗工程开通全球服务和嫦娥一至六号任务的成功。如今，90多岁高龄的孙家栋虽然不再去一线现场，但仍然密切关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由国际小行星中心命名的“孙家栋星”，在太空中向世人诉说着孙家栋航天人生的精彩故事。

